

【农村社会发展】

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

罗茜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随着家庭现代化的转型,代际出现资源和权力双重失衡但家庭仍然维持整体平衡样态的悖论。从家庭再生产视角出发,通过对家庭代际关系性质和功能的探讨,指出当前代际关系的双重失衡正是代际双方在家庭生存理性下采取的策略行动。通过采取资源下位优先分配、权力独立且合作、情感表达日常化与世俗化等调适手段,代际形成基于价值与情感整合的再平衡,并生成新家庭主义,在发挥家庭合力的同时带来家庭风险。上述研究表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家庭发展走向并不符合家庭现代化理论,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更加细致和持续的研究,家庭政策制定需要面向家庭整体。

关键词:代际关系;代际平衡;家庭再生产;新家庭主义;家庭政策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3)03-0106-11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家庭代际关系是指因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而产生的家庭成员纵向关系,其核心是亲子关系^[1]。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轴,代际关系一直是家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保证了人的再生产,而且构成了家庭组织的基础以及个体社会生活最紧密的核心。费孝通^[2]最早对代际关系进行了研究,他将我国家庭代际关系提炼为抚育-赡养型的“反馈模式”,并与西方家庭代际关系的“接力模式”进行区分。“反馈模式”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即家庭中的每一代人都要在抚育下一代人的同时,对上一代人给予反馈。“接力模式”则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每一代只承担抚育下一代的任务。两种代际关系模式虽然形式不同,但都在家庭内部实现了平衡。改革开放后,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出现严重失衡,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远高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面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巨大转变,学者提出了代际剥削、道德沦丧等观点,并认为村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伦理性危机”^[3-4]。贺雪峰^[5]通过对代际关系历史变动的考察,提出农村当前出现的代际关系失衡只是一种过渡现象,代际关系最终会走向更加理性化、较少亲情友好的相对平衡,并实现低度均衡。在此过程中,子代家庭表现出的独立性追求和个人主义也被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视为工业化发展下家庭的变动趋势之一,核心家庭与亲属群体间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弱,孤立的核心家庭成为主流^[6]。

值得关注的是,代际关系不平衡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甚至不平衡程度更为加深,出现“老人不老”^[7]、“老漂”^[8]、婆媳关系倒置等现象,家庭代际资源和权力地位出现不平衡、不对等。然而,在资源、权力双重失衡下,现代家庭仍然呈现出整体平衡样态,部分父辈不仅对子女的“不尽孝”给予宽容和免责,甚至主动对子代进行投入,家庭和谐紧密。如何理解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出现的这一悖论,学界进行了诸多讨论和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类观点:

收稿日期:2022-07-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21CSH030)

作者简介:罗茜,女,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一是代际交换说。这类观点认为代际双方对交换内容的认识出现差异,导致平衡原则发生变动,当前的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提前投资和交换。父代注重物质交换的先赋性的生命方面,强调生养之恩,子代注重物质交换的获致性的财物方面,强调现时的给予^[9]。为此,父代为了提高子代赡养的可能性,不得不加大对子代的支持,这也成为父代的投资行为。王跃生^[1]指出,费孝通总结出的代际关系“反馈模式”遵循代际互惠原则,随着抚育期和赡养期的间隔时期增长,代际关系应该是抚养-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两种关系并存且有互补的关系,形成代际互动关系间的及时性和延时性。陈皆明^[10]将代际交换称为一般性互惠行为以区别纯粹理性交换,认为父母投资与子女赡养间呈正相关关系。钟晓慧等^[11]则指出父代通过资源投入与子代建立起“协商式亲密关系”,从而增加子代承担孝道的可能性。代际交换观点强调代际关系中的个体理性,简化了代际双方的行动与意图,经济交换的理性人假设忽略了代际双方作为社会人行动意图的复杂性,经济与情感的交换也忽略了家庭成员关系与纯粹人际关系的差异。这类分析不符合中国人关系本位的认知结构,并且由于强调代际关系的对等性和工具性,忽视代际关系的伦理面向,在代际双重失衡下,这类分析极易导向代际关系的剥削性和伦理沦丧等结论^[12,3]。

二是伦理转型说。这类观点超越经济考量,认为当前代际关系的平衡核心在于家庭伦理的调适与统合。狄金华等^[13]借助“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调查”2011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对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类型进行定量分析,认为代际资源分配并未呈现伦理危机,而更多是伦理转向下位优先之后资源不足带来的分配困境。阎云翔等^[14]也提出下行式家庭主义和中国式社会自我主义的出现等观点。伦理转型观点的核心在于父代对子代看似失衡的行为是在家庭伦理规范和约束下做出的,并非出于等价交换的考虑。在家庭单元中,伦理规范从祖先和父母的幸福转向子女的幸福,正是在这一伦理导向下,父代愿意为子代付出和投入。伦理转型说把握了家庭这个基本社会单元,对代际行为的分析更加贴近经验实际,但同时存在分析模糊和泛化的不足。该观点对伦理转向的强调只是宽泛的判断,对伦理转型的动力、方式等未进行充分细致的分析,阎云翔等的分析也仅限于提到伦理转型后的情感结构,无法呈现代际关系在当前更为具体和复杂的变化内容与实践。

三是家庭功能主义说。该观点在伦理转型基础上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内部调适进行了细致呈现。家庭功能主义认为家庭的现代化转型不是与传统割裂的过程,而是传统伦理在当前的延续和变迁,子代的发展和幸福生活成为家庭发展目标,并整合家庭资源和结构^[15]。“两栖老人”“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等都成为家庭内部自主调适的家庭策略和实践,家庭的整体平衡建立在代际双方基于家庭目标共同合作基础之上^[16-17]。家庭功能主义视角对家庭整体目标下代际双方行为上的策略调整,以及家庭整体从伦理主导转向功能主导的分析讨论细致深刻,但其不足在于对代际关系再平衡实现的具体方式和机制缺乏足够分析。

本文在家庭功能主义视角的基础上对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做进一步分析,以家庭再生产为切口,对当前家庭代际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解释。家庭再生产是父代家庭向子代家庭绵延、子代家庭逐渐成为独立自主家庭的代际更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代际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形式和内容^[15]。本文认为代际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其平衡标准遵循家庭理性而非个体理性,代际关系平衡以家庭为单位实现“模糊性平衡”^[18],代际规范会随着家庭再生产情境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并促使代际关系形式发生调适,形成新家庭再生产下的实质再平衡。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三代家庭成为典型的家庭结构,本文将以60后、90后和未成年子女构成的三代家庭作为主要分析对象^①。

① 本文经验材料源于笔者自2019年在全国各地农村进行的调研。本文涉及调研地点主要包括湖北武汉、陕西西安、河南焦作等地,各村调研时间约为20天,重点关注农民家庭代际关系和家庭转型等问题。

二、家庭代际关系的资源与权力失衡

(一) 资源失衡:父辈支持扩大化

传统农业时期,代际支持呈现大致均衡。父代对子代的支持主要限于在子代未成年期间为其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持,待子代成年后帮助其成婚。囿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养育标准并不高,方式较为粗放,养育孩子只是加一副碗筷的事。儿童在成长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村社田间与小伙伴一起玩闹度过的,大孩子还承担起照顾幼童的责任。子代成长到一定年龄,需要承担相应的家庭劳务分工,帮忙减轻家庭负担,这也降低了父代的养育成本。家庭对子代缺乏明确的发展性预期,对子代教育投入和资源支持较少。子代婚姻是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支出项目,一般需要在村内新建房屋或至少翻新房屋。由于是本地婚姻圈,相互知根知底,村庄舆论还能发挥作用,彩礼保持在正常水平,婚姻成本处在普通农户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父代与子代合力共同完成婚姻成本的积累任务。子代完婚后,父代代际支持任务基本完成,可以进入休息和退养阶段。子代婚后大多与父母同住,在以父母为家长的同居共财家庭单元中,子代承担起对父母的日常照顾,并为老人提供精神慰藉和医疗开支等。鉴于老人寿命以及医疗水平的限制,子代的赡养压力整体并不高,形成了传统农业时期代际的低度相对均衡。

当前,代际支持明显失衡,父代资源支持力度远远超出子代反馈力度,表现在包括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内的代际支持强度和限度的增加上。其一,代际支持强度增加,表现在子代抚育成本和婚配成本的提升上。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90年代执行越发严格,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90后这代人大多没有兄弟姐妹,家庭结构的少子化使儿童越来越成为家庭的焦点,儿童抚育水平和教育期待也逐渐提升。子代在家庭中不再作为生产者和劳动力参与家务分工,而是成为纯粹的消费者,教育期待的提升也使教育开支成为代际支持的刚性内容。这些都加重了代际支持的资源支出。不仅如此,流动社会打破了本地通婚圈,女性外流以及出生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女性资源缺失加大了农村男性青年的婚配难度,由此,男性通过提高彩礼增加自身竞争力,进而不断推高婚姻成本,城市有房已成为婚姻标配,天价彩礼也屡见不鲜。在笔者的多地调研中,都有中年父母反映为子代婚姻发愁、压力大的情况,甚至存在父代在孩子一出生时就开始计算婚姻成本并为之持续努力积累的案例。

案例1:陕西西安,冯叔50岁,他给我们算了一笔结婚账。在当地,进城买房成了结婚刚需,买房首付30万~40万元,汽车也不能少,需要花费10万元,彩礼加上“三金”大概8万元,另外还有酒席费用等,没有六七十万元结不了婚,普通家庭一年积累4万~6万元,得持续积累十几年,并且在此期间,只有家庭稳定不出事,才能保证在子代结婚时用钱不紧张。因此,冯叔自孩子出生时就开始为之积累,除了种十几亩瓜,闲时还要到城里打零工。

其二,代际支持限度扩大。当前,代际支持并不随子代结婚生子而结束,相反,隔代抚育和日常生活支持已成为当前代际支持常态。这类合作受代际居住格局而形成不同模式:一类是代际城乡分离家庭,子代进城就业生活,父代留守农村。代际合作模式一般是父代中的女性进城协助子代抚育孙辈,同时帮助料理家务,准备一日三餐,为子代创造良好的生活空间,与子代形成劳务合力。父代中的男性则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并在农闲时期找点零工,与子代形成资源合力。另一类是代际共同居住在村,这类家庭居住模式大多出现在城郊农村以及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农村。代际合作模式一般为代际共同从事生产获取家庭资源,由于父代劳动力素质相对偏低,收入通常低于子代,且大多为非正规就业,时间较为灵活,承担了更多的孙代日常照料,日常家务和生活开支也由父代承担。笔者在河南焦作遇到的一户家庭即为共同居住在村的代际

合作模式典型。

案例2:河南焦作,陈阿姨与老伴均62岁,儿子38岁。儿子于2006年结婚,并育有一子,14岁,在县城读初一。三代人同住,晚上一起吃饭。老人到街上摆地摊卖百货挣钱补贴家用,不向儿子要钱,家庭大部分开支由老人负担。儿子儿媳在县城工厂上班,工资主要用于购买家庭必需品,并负担小孩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1.8万元。家庭农地流转地租收入2400元主要用于缴纳全家的养老保险和医保。小孩从小就由老人帮忙带,老人每年为小孩买衣服和零食需要花费2000~3000元。家务基本由老人承担。

反观子代反馈,其力度较为有限,而父代对子代反馈的预期也呈现低度甚至底线化。子代对父代的赡养反馈大多始于父代无法自理,此前,则是长期的父代自养和支持子代阶段。当父代无法自理时,其寿命往往也不长,因此子代反馈时间短。工作和生活空间的区隔也使代际多相互分离,子代对父代的支持大多是买点日常用品,或是发过年、过节及生日红包,代缴水电费等。这些费用的金额并不大,相较父代对子代长期且各个关键节点上的支持力度,子代的反馈明显不足,双方存在巨大的不对等。

(二) 权力失衡:代际权力颠倒

传统农业时期,家庭代际伦理遵循父慈子孝,并且重孝轻慈,要求“敬亲”“顺亲”。宗亲制下,父代基于血缘关系天然具有权威。农业生产时期生产资料以土地为主且有限,社会流动性低,父代借助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进一步巩固自身家庭权力地位。传统家庭形成以父代为代表的同居共财合爨大家庭,在农业生产力低下、农业剩余有限情况下,家庭必须维持紧密合作才能完成家庭的生存与维持目标,因此,父代往往会延迟分家时间,对子代婚姻和职业选择也会做出一定干预,以尽可能形成大家庭合力。一般而言,在所有儿子成婚后,家长才会召集全部儿子开会并在相关亲友的见证下进行分家。年轻媳妇通过婚姻关系进入大家庭,代际关系超出亲子关系范畴,传统时期的婆婆则作为父权制的代表对年轻媳妇进行指导,并将年轻妇女整合进大家庭中,实现家庭合力。总体而言,传统时期父代作为长者,掌握家庭权力和话语权,形成对家庭成员的支配,子代必须顺从父代。

当前,代际权力等级结构被打破,代际权力发生变动,并形成代际平权化,表现在分家仪式和婚配权力等方面。不同于传统时期一次性分家,或者说父子分家,当前子代出于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往往要求婚后即分家,形成多次分家局面,即使是独子家庭,子代也要求与父代家庭分开,拥有独立权力。分家仪式逐渐简化,“半城半乡”家庭则形成“不分而分”的分家样态。分家后的子代实现了自身独立,同时摆脱了对大家庭以及兄弟姐妹的责任,增加了父代负担。父代权威逐渐旁落,失去整合大家庭的权力和能力,父代家庭收缩至夫妻核心家庭。子代和父代各自形成核心家庭,各自当家,代际形成平权格局。在婚配权力上,父代也越来越失去话语权,传统时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变成当前“父母顶多起建议作用,起不了决定作用”。即使父代已经为子代结婚做好所有准备,子代仍能以自己不喜欢为由而逃婚,父代也无能为力。

婆媳关系同样发生倒转。传统时期,媳妇在家庭里处于最低地位,她们只能承担与忍受。当前,年轻媳妇的家庭地位提升,家庭话语权增大,婆婆要努力与年轻媳妇形成配合,尽力满足儿媳需求。不少婆婆表示,“现在儿媳妇地位高得很,不用说她们来照顾老人,她们不顶嘴、不寻事、不对着干就已经很不错了”。

另外,代际文化传承模式也出现颠倒。伴随着社会急速变迁和科技文化进步,中年父代基于个体阅历和认知形成的经验逐渐不再适用于当下现实,文化传承模式逐渐突破父代向子代的简单延续,出现亲子间的“文化反哺”^[19]。常见的表现在子代指导父辈学习使用智能网络技术、现代化家电,向父代科普各类生活和健康常识等。作为年轻人的子代对新事物理解和接受能力

更快,适应能力更强,能很快习得和掌握现代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价值观、生产方式和知识技术等,代际文化优势出现倒置,形塑出文化反哺现象。子代掌握的文化优势进一步对父代权威地位形成挑战。

总体而言,家庭代际关系从传统时期的低度均衡发展成当前资源和权力的双重失衡,家庭内部呈现重少轻老格局。按照常理推论,面对资源投入的不对等以及权力地位的颠倒,代际应该会出现关系紧张,尤其“被啃”的父代应该会产生不平衡和怨气,权威地位的消失更应该带来失落与不适应,进而生发出家庭内部的巨大张力。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多数家庭形态保持稳定,家庭关系缓和甚至和谐融洽。应如何理解现实与常理推论间的巨大差异问题呢?

三、家庭代际关系的价值与情感整合

代际关系的双重失衡意味着传统代际关系发生改变,双重失衡下的代际关系仍能维持稳定的家庭形态,又表明代际关系达成了一种再平衡,这种再平衡源于新的代际规范对代际双方行为与观念的重塑和整合。为此,需要明确代际规范是什么,新的代际规范如何促成代际关系的再平衡。

(一) 代际规范变动与再确立

传统时期代际规范遵循血缘伦理,讲究“父慈子孝”,且重孝轻慈,建立起以“亲亲、尊尊、长长”为核心的孝道伦理规范,在祖荫庇护下,每个人都为延续祖荫贡献力量,并从中获得短暂生命的永恒意义^[20]。而在家庭现代化转型的当下,代际规范出现明显变化,从重孝轻慈转为重慈轻孝,代际规范旨在以子代家庭发展为核心的家庭整合。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子代家庭发展指向复杂再生产。围绕这一目标,代际进行了资源的下位优先分配与集中、权力在两代核心家庭间独立且合作以及情感表达的日常化与世俗化等三方面的调适。

首先,代际合作方式以资源为主,实行下位优先分配与集中原则,强化家庭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城市化的家庭再生产目标意味着家庭从传统时期的维持型再生产转变为当前的发展型再生产,对家庭发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家庭发展能力不仅包括家庭生产发展能力,而且包括家庭抵御风险能力,与家庭资源充裕程度和代际合力程度紧密相关^[21]。家庭需要围绕再生产目标对家庭劳动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进行功能导向的重新优化配置。农民家庭收入源于务农与务工两部分。务农收入与土地规模有关,农民家庭普遍“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农业收入稳定且有限。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比更大,其与劳动力素质和数量有关,对普通农民家庭而言,劳动力数量影响更突出。因而,中年父代在完成子代的结婚生子任务后,仍作为重要的劳动力资源,承受着家庭持续发展的压力。围绕城市化目标,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年轻人在城市从事正规就业,获取务工收入,父代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业机械化的推广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种植时间,许多父代农闲时还会就近打零工以扩大家庭收入,在减轻子代赡养压力的同时,还能够为子代提供支持。通过对家庭劳动力的充分调动以尽可能多地获取和积累资源,家庭满足进城购房、完成城市化第一步的资源条件。

其次,代际合作方向表现为权力在两代核心家庭间的相互独立与合作,且子代核心家庭统合父代核心家庭。子代家庭权力的上升尤其婆媳关系的倒置,形塑出以子代核心家庭为主的代际合作模式。此处的家庭权力主要指当家权,是对家庭的社会交往、互助合作以及人情往来等方面安排的权利^[22]。家庭的扩大化再生产以子代核心家庭为主体,习得现代化观念与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子代围绕家庭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教育方式等进行资源配置,在实践城市生活逻辑的同时,也为家庭的城市化再生产做准备。父代家庭起配合和辅助的作用,大多不干涉子代家庭的决定。子代作为独立人情单元在城市建构的业缘、趣缘关系构成子代家庭融入城市的拉

力,而父代家庭作为另一人情单元仍维持村庄内部的人情往来与互动,为自我保留生活空间,也为家庭关系的紧张提供缓冲带。代际权力的相互独立与合作实质上是父代家庭权力向子代家庭的部分让渡,是子代发展主导下的权力合作。

最后,代际合作过程中情感表达的日常化、世俗化改善与增强了合作体验与效果。代际作为亲密关系,在传统时期表现为相互扶持、牺牲和奉献,双方情感表达遵循孝道规范。子代必须服从和尊敬父代,为父代提供义务性支持和供给,父代则全心全意为子代付出,秉持公平,代际情感的规范与和谐促成传统代际关系的稳定。随着代际平权、家庭结构少子化,代际亲密关系从规范化逐渐转变为世俗化和个体化,并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有学者指出,当前家庭矛盾已从传统时期对家庭资源的竞争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摩擦^[23],具有微观和日常化特点。代际日常情感表达的强化,包括日常平等亲密的交流、赠送私人小礼物、更加关心和在意对方、回应对方更为及时等。这些方式带有个人主观性,是个体私人情感的主动表达,而非规范或责任约束下的行动,有利于情感建构,提升代际关系情感浓度,也能够减少日常代际摩擦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在湖北武汉调研时一位60多岁的妇女谈道:“年轻人对钱看得比较淡泊,基本存不住什么钱。我们也没办法,必须帮忙,像他们买车位,我就给了10万元。反正眼睛一闭我们的钱也都是他们的,现在还能做个顺水人情,以后他们跑医院看我们还能勤点。”“儿媳嘴巴能够甜一些,回家后妈妈长妈妈短的多说几句,不能回来饭一吃、碗一放就走了,这样不好,婆婆不开心,也不喜欢,老人就喜欢听好话,你嘴巴甜一点,老人给你钱也给得快、给得开心。”父代的顺水人情、子代的甜言蜜语在日渐拉长的“可交换期”里拉近了彼此的关系,使代际合作变得更为顺畅和舒心,提升和改善了代际合力效果。

(二) 价值与情感双重整合下的代际关系再平衡

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从来都不是代际双方个体理性的考量,而是家庭理性主导下的反映。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不仅是生产、生活单元,更是宗教单元^[24]。钱穆将家庭比做中国人的教堂^[25],许烺光提出“父子一体”,指出中国人处在“祖先-子孙”的血脉延续之中,通过宗族绵延个体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超越,实现有限肉体生命的无限意义^[26]。这些都表明包括代际关系在内的家庭关系既具有世俗性又带有超越性,因而关系的平衡便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理性计算和指标性对等,还具有因超越性带来的类似“集体欢腾”般的忘我体验,富有超脱性。

传统农业时期,家庭为伦理本位,由伦理主导家庭各要素配置。以传宗接代、家庭血脉绵延为代表的“宗”的观念内化于家庭成员心中,并成为本体性价值追求^[27]。有限家庭资源和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维持并巩固了传统家庭伦理。家庭再生产赋予的超越性价值以及社区舆论生产的惩罚威慑成为父代行使大家长职责的动力与保障,正是在家庭实现绵延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在家庭中短暂地既充当子代也充当父代,既承担了抚育责任,又获得了赡养反馈。因而传统时期每一代人通过传宗接代实现家庭绵延获得代际平衡,这便是代际的延后效应^[5]。家庭稳定的传宗接代伦理观念对代际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代际平衡呈现出强伦理规范整合下的责任表达。

工业化与现代化转型时期,家庭再生产转向复杂再生产,进城实现阶层跃升成为当前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在进城买房、教育竞争与体面就业等多重任务压力下,家庭围绕新发展目标对家庭资源、权力和价值进行重新调适,实现了以功能为主导的家庭整合,从而呈现出当前代际关系看似不平衡之下的家庭稳定形态。但通过调适实现的家庭功能整合只是解释了家庭稳定形态的生成,还需进一步解释的问题是稳定家庭中的家庭关系为何是和谐而非紧张的,代际双重失衡带来的巨大张力如何被合理化以至消解,如此才能理解家庭稳定形态何以持续和维持,并不断追求复杂再生产。答案在于价值和情感赋予代际关系良好建构的助力。

其一,子代幸福带来的价值和精神满足使父代超越对资源投入的斤斤计较。在城市化发展

的巨大压力下,子代家庭幸福单凭自身难以实现,因而有极强的将父代卷入自身发展目标、延长代际支持限度的动力。父代出于责任伦理与舐犊情深的自然感情与子代形成合力,这种合力强度和限度高,出现双重失衡,而非形成贺雪峰所言的理性的低度平衡^[5]。家庭目标实现难度的增加与工业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为此创造了条件,前者提供双重失衡的必要性,后者赋予双重失衡的可能性,作为劳动力的父代在自身养老有基础保障的前提下能够更加全力协助子代。支持子代过上美好生活、获得家庭幸福的目标不断合理化父代的超额资源支持行为,子代的发展以及幸福生活为父代提供了物质交换之外的价值实现。原本被动卷入提供支持变成父代主动参与实现自我价值,多数老年父代都表示自己心甘情愿为子代付出,只要子代过得好自己就感到很满足:“就这么一个孩子,你不帮他难道看着他过不好吗?不可能的,我们能动就多帮一点,他们幸福我们也开心。”这进一步表明具体且世俗的子代幸福而非传宗接代成为父代的价值追求,在努力支持子代的过程中,父代获得了价值满足。失衡的资源支持成为父代价值实现的手段,追逐价值实现过程中获得的满足感消弭了资源持续投入可能导致的不公平感。

其二,平权代际双方情感的私密化和亲密性化解了父代权力旁落可能产生的失落感。代际平衡一直都包含情感维度,即“心意”的相互表达^[28]。传统农业时期表现为子代对父代的“顺”,父代对子代的“慈”,双方情感表达克制且内敛,且多基于公共层面的表达。现代化打破了传统规范束缚,个体情感表达更为多样自由,而“心意”对等作为弹性很大的标准^[28],使代际平衡更具个体性。当前代际互动中,即使子代只是简单地在日常生活中给父代一些小礼物,或是给父代打来电话关心几句,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回报和反馈,这些相较于父代资源的投入更是微不足道,但父代仍对子代有限的物质反馈表示理解,并感到满足。其核心在于这些小举动让父代感受到“孩子心里有我,想着我”,无价的“心意”表达给予父代满足,并合理化自己对子代的付出。传统等级权力结构赋予的家长威严和敬畏感被平权化下温情脉脉的情感表达替代,父代仍然能够体会到家庭成员相互的情感关联,以及家庭“劲往一处使”的内部团结感。日常相处中代际双方也会采取相互退让、教养分离^[29]等策略以避免生活矛盾对双方情感的伤害,从而维持相互满意的交往状态。因而,日常情感交流与表达在“心意”层面的体现,能够化解代际合作中的资源不平衡张力和权力旁落给父代带来的被剥夺感,促使代际合作和谐稳定。

家庭代际关系在新的家庭再生产目标下实现了价值和情感上的双重整合,不仅整合力度强而且关系私密化、亲近化。事实上,正是家庭代际关系在资源和权力上的双重形式失衡构成了家庭代际关系的实质再平衡的具体实践和基础。资源和权力的失衡其本质源于父代和子代两个核心家庭在现代化发展导向下基于生存理性所作出的策略行动,是家庭积极应对复杂再生产进行代际规范调适的表现。在代际双方不断调适的互动过程中,追求子代幸福的价值与相互亲密的情感表达润滑了代际关系,补偿了资源和权力的失衡,使得代际关系能够持续积极有效面对复杂再生产目标。家庭代际关系的平衡本质上是父代和子代两个核心家庭基于家庭本位的家庭理性行为。

四、家庭代际关系再平衡与新家庭主义

(一) 代际关系再平衡与家庭再生产

代际关系平衡是代际关系持续的重要条件。作为家庭主要成员间的互动形式,以及家庭再生产实现的载体,代际关系包含家产转移、权力让渡以及价值实现等内容。不同家庭再生产情境形塑出不同的代际规范以促成代际关系平衡与稳定。

在传统时期,传宗接代、子孙延续是家庭“教义”所在,代际关系尤其亲子关系构成家族延续和家庭简单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在社会流动性低、农业剩余有限的背景下,父代掌握家庭权力,

分配家庭资源,以尽可能完成家庭人口再生产和村庄人情的延续。代际合力完成简单再生产最终服务于家庭或者家族这一整体,传统时期代际权力和资源的看似不平衡,实则是在传宗接代、家族绵延这一强伦理规范和反馈下获得补偿,实现代际关系在家庭再生产情境下的持续互动与合作。代际关系的平衡便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的比较,而是在代际互动和合作基础上实现家庭利益的统一性^[10],实现共同的人生价值。换言之,代际关系平衡并非两代人之间单项或几项内容的平衡,而是以家族绵延为目的、多种功能综合下达至的平衡,实现家族绵延正是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特色^[30]。

转型时期,农民家庭再生产目标由简单再生产转向复杂再生产,并对代际关系在家庭发展目标、家庭发展面向和家庭发展合力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代际规范在家庭理性下进行调适,同时,家庭的转型变动成为代际关系进行调适的基础。

首先,家庭发展目标由传统时期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的简单再生产发展为复杂再生产、实现家庭阶层跃升,从而带来资源需求的大幅提升。阶层跃升目标的达成以完全城市化为基础,即实现居住城市化、就业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31]。具体来说,需要在城市购房、实现在城市相对稳定且体面地就业、在城市完成家庭再生产并抚育下一代,这三方面内容都需要充裕的家庭资源做支撑。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化逐渐从精英家庭进城阶段发展为普通家庭进城阶段,城乡分异成为农民家庭社会竞争成功与否的标志^[32],家庭发展和村庄竞争需要都使进城成为家庭刚性需求。而这仅仅是第一步,融入城市、真正过上城市体面生活是更长期的任务,往往还伴随着子代陷入消费陷阱的危机。

其次,家庭发展面向由传统时期面向村庄社会的社区性家庭转变为向外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家庭,需要更快习得城市化生产生活方式。以子代家庭为代表的核心家庭与村庄的关联不断弱化,长时间的学校教育以及现代化观念的习得使子代越来越成为“村庄中的外人”,子代逐渐从村庄脱嵌。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从事非农劳动获取务工收入,基于业缘、趣缘等建立起社会关系,子代家庭的生产生活皆去乡土化。换言之,在工业生产时期,家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改变,随着家庭流动性的增强,传统时期通过维持村庄内部人情往来稳固家庭地位以获取村庄互助的需求已不存在,在流动的外部社会奋斗并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家庭追求。家庭社区性弱化,村庄公共性降低,家庭内部私密化互动而非村庄成员的交往成为子代家庭生活重心,家庭成为家庭成员的情感“避风港”。

最后,家庭发展合力方式由传统时期同居共财合爨的大家庭或者说以父母为代表的父辈家庭统合转变为“新三代家庭”结构^[33],两个核心家庭各自作为独立的财产核算单元。子代习得现代观念追求自主与独立,但同时家庭发展压力又倒逼其与父代合作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促成“分而不离”的家庭样态。依照居住空间,家庭结构可以分为“半城半乡”家庭和“同一屋檐下的两个家庭”。家庭结构的拆分和变化使得代际互动形式发生改变,不是家庭内部父代和子代两代人的互动,而是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之间的复杂互动,即由家内代际关系发展为家际代际关系^[1],孙代作为子代家庭的组成部分自然地被纳入父代代际支持范畴,代际合力强度增加。

转型时期,家庭再生产情境的变动促成家庭代际关系在新的代际规范下进行调适并追求家庭再生产目标的实现。代际关系形成强情感互动,并以子代家庭幸福为价值满足的平衡补偿与实践,而非传统时期强伦理反馈,以家族绵延为家庭伦理的平衡补偿实践。

(二) 新家庭主义与家庭合力

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平衡表明家庭主义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延续与发展。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要类型,代际关系在转型时期随家庭再生产情境变化进行调适,并形成新的代际规范,这表明家庭现代化的转型进程并非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所设定的单一、线性路径。按照家庭现代化理论所言,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家庭结构将逐渐核心化,家庭伦理将逐渐弱

化,家庭关系将逐渐离散化,进而导致家庭功能弱化和外化^[34]。然而,代际面对家庭发展灵活调整所形成的代际合力表明中国家庭本身并未衰弱和解体,家庭形成“新三代家庭”结构以实现代际更灵活的分与合,家庭资源在家庭内部围绕整体目标实现集聚和优化配置,家庭关系在平权化的日常互动中更加亲近、亲密,家庭仍然承担着生产、抚育、赡养、互助、安全、情感满足等功能。因而,中国的家庭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非单向线性变化。

与传统家庭相比,当代家庭也在变动的发展实践中形塑出新家庭伦理,而非传统家庭主义的简单重复。传统家庭伦理核心是“家庭至上”,家庭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利益,人的一切活动都围绕家庭而展开,乡土和血缘造就家庭观念稳定性和至上性的同时,也生产了家庭观念的狭隘性^[35]。家庭内部形成等级制家庭伦理,依照“血缘-宗族”观念而形成传统宗法秩序。每个家庭成员都肩负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伦理责任。但新家庭主义下的代际合力并非出于对传统家庭主义价值观的传承,而是基于家庭功能性需求考虑,合作基础更多在于实现子代的幸福和发展,而非传宗接代。其更为强调子代家庭发展的权利,肯定父代对子代的无限度支持,但自下而上给予父代家庭的反馈较为不足。换言之,新家庭主义是以子代家庭为核心的家庭主义,其家庭伦理并非对所有家庭成员均质且普遍。同时,家庭成员在合作过程中拥有自主能动性以调整合力强弱,换言之,个体利益在家庭利益之下有所保留。家庭利益所涉范围也有所缩小,仅限于父母与子女的利益和幸福,而非传统家庭伦理意义上的扩大家庭甚至是血缘家族^[36]。

五、总结与讨论

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成员围绕家庭再生产在家庭发展目标、家庭发展面向和家庭发展合力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进行了新的代际互动实践调适,并形成新的代际规范,包括资源的下位优先分配与集中、权力由子代核心家庭统合父代核心家庭形成独立与合作,以及情感表达的日常化与世俗化等三方面。当前代际关系出现的资源与权力的双重失衡正是代际积极互动调适下的策略行动和结果。在家庭复杂再生产情境下,家庭成员围绕子代幸福目标实现价值整合,代际平权下双方亲密互动达成情感整合,价值与情感的整合弥补了子代资源反馈上的不足,弹性标准的价值与情感反馈、量化的资源共同促成当前代际关系以家庭为本位的模糊性平衡。也正是在应对家庭转型的互动实践中,家庭形成新家庭主义。这也表明家庭仍然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体认同的重要社会单元,并具有极强的能动性和韧性。

然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代际关系再平衡之下仍然潜藏着家庭风险,尤其是养老危机,尽管这并非源于家庭伦理的沦丧,而是家庭无奈的策略选择。

一方面是家庭内部高龄老人的养老危机。家庭代际合力以实现子代核心家庭发展为目标,为更高效地形成家庭合力,家庭在具有较强劳动能力和经济获取能力的中年父代和年轻子代间达成合作,家庭资源向下集聚。这使得原本在家庭内部承担照料高龄老人责任的中年父代(同时也是中年子代)从家庭养老责任中“退出”,高龄老人面临无人照料的难题。并且,资源的向下集聚也进一步造成对高龄老人的养老资源挤压,使老人处于维持型生存状态。高龄祖代由于“整合性溢出”^[37],被迫自养,养老生活缺乏稳定保障。

另一方面是中年父代的精神高压。比起年轻子代,中年父代仍有较强的责任伦理,要完成子代结婚生子的人生任务,子代婚姻成本受多重因素影响大幅提升,给父代带来巨大压力,一些地方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在与子代核心家庭形成合力完成家庭目标过程中,中年父代承受了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需要指出的是,年轻子代受市场化影响程度深,更易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陷入消费陷阱,耗散资源,弱化代际实质合力,进一步增加父代心理压力。不

仅如此,在代际合力模式中,母亲在城、父亲在村的中年夫妻分离现象也较为普遍,导致中年父母家庭不完整。在村生活的中年男性需要独自应对家庭劳务,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压力大;在城生活的中年女性因脱离熟悉的村庄环境并与子代家庭长期亲密共处,难免产生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

新家庭主义的生成表明家庭成员行为并非个体理性行为,而是基于家庭整体考量的结果,因此,与家庭相关的社会政策制定必须对转型期的家庭性质加以认识,并持家庭主义立场。家庭政策要以家庭整体作为对象,实践整体性治理^[38]理念,从而提高家庭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J]. 人口研究, 2008, 32(4):13-21.
- [2]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 20(3):7-16.
- [3]陈锋.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2):49-58.
- [4]申端锋. 农村生活伦理的异化与三农问题的转型[J]. 中国发展观察, 2007(10):30-32.
- [5]贺雪峰.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 江海学刊, 2008(4):108-113,239.
- [6]唐灿. 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 社会学研究, 2010, 25(3):199-222,246.
- [7]何倩倩. 城镇化、家庭再生产压力与代际关系重构——以北方农村“老人不老”现象为例[J]. 学习与实践, 2019(12):96-104.
- [8]陈辉. 老漂: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代际支持的新方式[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2):24-29.
- [9]郭于华. 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81.
- [10]陈皆明. 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6):131-149.
- [11]钟晓慧, 何式凝. 协商式亲密关系: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J]. 开放时代, 2014(1):155-175.
- [12]孙新华, 王艳霞. 交换型代际关系:农村家际代际关系的新动向——对江汉平原农村的定性研究[J]. 民俗研究, 2013(1):134-142.
- [13]狄金华, 郑丹丹. 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J]. 社会, 2016, 36(1):186-212.
- [14]阎云翔, 杨雯琦. 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J]. 探索与争鸣, 2017(7):4-15.
- [15]李永萍.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7(2):44-60.
- [16]肖琳. 城乡两栖: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发展的策略性实践——基于“两栖”老人现象的讨论[J]. 兰州学刊, 2022(4):135-146.
- [17]王进文. 穿梭于城乡之间的“两栖”老人:表现特征、生成逻辑与实践影响[J]. 兰州学刊, 2022(4):147-160.
- [18]杨华. 当前我国农村代际关系均衡模式的变化——从道德性越轨和农民“命”的观念说起[J]. 古今农业, 2007(4):4-7.
- [19]周晓虹.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 社会学研究, 2000, 15(2):51-66.
- [20]汪倩倩. 后乡土社会孝道嬗变的现实图景与形成机理[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3):28-35.
- [21]卢青青. 家庭自主性与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41(10):135-144.
- [22]陈讯. 妇女当家:对农村家庭分工与分权的再认识——基于五省一市的6个村庄调查[J]. 民俗研究, 2013(2):26-35.
- [23]李永萍. 生活政治:理解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的一个视角[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 43(1):172-179.

- [24]王德福. 中国农村家庭性质变迁再认识[J]. 学习与实践, 2015(10):85-91.
- [25]钱穆. 灵魂与心[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0.
- [26]许烺光. 祖荫下: 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M]. 台北: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2001:205-211.
- [27]贺雪峰. 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 开放时代, 2008(3):51-58.
- [28]刘汶蓉. 活在心上: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关系与孝道实践[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4.
- [29]梁伟.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20(6):789-796.
- [30]杨善华, 贺常梅. 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41(1):71-84.
- [31]罗茜, 贺雪峰. 城郊农民就近城镇化的实践机制分析——基于南京市H镇的调研经验[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1(5):55-60.
- [32]王旭清. 代际分化与城乡分异: 中西部二代农民的阶层分化逻辑[J]. 当代青年研究, 2020(3):46-53.
- [33]张雪霖. 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新三代家庭结构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5):120-126.
- [34]李永萍.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3):41-51.
- [35]张怀承. 中国的家庭与伦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49-58.
- [36]刘汶蓉. 家庭价值的变迁和延续——来自四个维度的经验证据[J]. 社会科学, 2011(10):78-89.
- [37]胡晓映, 吕德文. 整合性溢出: 老年人自养秩序的一种解释——基于豫、鄂、湘三省的田野调查[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9(3):70-80.
- [38]彭希哲, 胡湛.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12):113-132,207.

(责任编辑: 刘浩)

The Rebalancing Mechanism of Rural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n Transition Period

LUO Xi

Abstract: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s the main axis of family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mily, the paradox of the dual imbalance of resources and power appears between generations, but the family still maintains the overall bal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reprod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double imbalance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s a strategic action taken by both generations under the family survival reason. Through the adjustment of preferenti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dependent and cooperative power, daily and intimate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balancing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values and emotions is formed, and the new familism is generated, which poses family risks while exerting family synergy. The abov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fami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theory of family modernization, showing its own complexity and particularity, which requires more detailed and continuous research. The formulation of family policy needs to face the whole family.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ntergenerational Balance; Family Reproduction; New Family Doctrine; Family Policy